

◎ 文学聚焦

网络文学研究的尴尬和出路

徐兆寿



让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过去不久的往事。1990年代末，网络文学揭竿而起，慢慢树起了一面旗帜。到了2012年前后微信等新媒体出现后，传播的速度更加快捷，大量的草根写作开始影响中国，使中国从民间到官方都出现一种“影响的焦虑”。网络文学真正地影响着中国。到这个时期，官方才开始引导，现在，官办的网络作协成立。网络文学似乎名正言顺了，也有了必要的地位，但其实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正视。

去年11月22日参加在西安召开的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有一个议题是“新媒体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当时一个疑惑便产生了：什么是新媒体文学？它与网络文学又有什么区别？难道网络文学已经属于过去时了？新媒体文学与传统的大学文学又有什么质的不同吗？在考察这些概念与问题时，便发现自网络文学这一概念陡生之时起，便隐藏了无数未知的问题，于是也就自然地给后来者留下几枚“炸弹”。故而十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争执不休，后来因为无力解决，争执越来越少，似乎已经解决了问题，实际上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明显。如果再不清理这些问题，恐怕以后会生出无数的难堪。

概念需要重新确定

既然要重新探讨网络文学的概念，我们不妨以网上流布的概念来进行分析。在百度中输入“网络文学”一词，出来一段解释：“网络文学，指新近产生的，以互联网为展示平台和传播媒介的，借助超文本链接和多媒体演绎等手段来表现的文学作品、类文学文本及含有一部分文学成分的网络艺术品。其中，以网络原创作品为主。”

我们发现，网络文学是以媒介来进行定义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就要问，什么是文学？文学可以有题材的划分，也可以有民族国家地域的划分，也可以有时代的划分。它的一个特点是可以将文学或以体裁或以时间清楚地划开。但网络文学这一个临时起意的概念在当时还可以理解，在运用的过程中就越来越显得不能自洽了。

网络文学在当时是相对于传媒媒介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而言的一种存在。因为这些媒介有门槛，限制了很多文学的发表，自然也限制了很多人事事文学的可能性。文学被压抑着。网络的诞生解放了文学，打碎了原有的文学发表的门槛。从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是进步。但人们对网络文学的看法却正好相

反，对网络文学的不屑一顾司空见惯。为什么呢？因为在人们的理解中，文学因为长期的压抑自然生成了一种评价的机制。在当时，这种机制还一直在起作用。但是，到了新媒体迅猛发展的今天，这种心理机制已经在慢慢瓦解。这是网络传播所导致的革命。当然，新的压抑必然来临。文明永远是有界限的，自由是有边界的，艺术一定是戴着时代的镣铐跳舞的。网络也一样。现在，这个界限正在生成。

将近20年之后再来看媒介，人们对网络的青睐已经远远超过期刊与报纸这些纸媒。现在，手机阅读虽然还受到各种诟病，但人们在习惯。在这种习惯中，纸媒已经成为官方意志或评价文本的一个显征，但不再是意义与信息的主要载体，甚至更不是价值的主要载体。

现在，很多文学特别是随笔、政论和带有草根性的文学已经首先在网络尤其是新媒体上发表了，余秀华，这个草根诗人在新媒体上走红。范雨素，一个北京的育儿嫂因一篇《我是范雨素》的文章而红遍中国。期刊或报纸因为受众的原因再也不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即使要产生这样的影响，也要借助于新媒体。人们越来越习惯首先在新媒体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期刊或报纸仿佛成了新媒体文学的摘选。虽然期刊或报纸一再地向作者重申，投来的稿件不可在网上发布，只有在期刊或报纸发表后方可去发布于网络，但这更进一步说明无论是报刊还是网络，只是发表的媒介而已，文本本身并无二致。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最终还只是一个媒介，而所有的文学包括古典文学都已经呈现在网络上，或者说在网上被N次发表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来看网络文学就是文学的总体的了，还会有什么真正的网络文学吗？

研究网络文学的学者因为要捍卫这个概念的狭隘性，所以寻找了很多网络文学的特征，如超级链接、多媒体、及时评论、首发等特点，但除了首发外，哪一种文学在网上没有这些特点呢？《论语》发表后读者依然可以留言评论，也可以有超链接，把过去人们的研究成果都链接上，也可以有多媒体参与。首发，成为唯一的特点。还是一个媒介的问题，并非文学的问题。

从媒介的角度来看，我们从来没有过甲骨文学、竹简文学、纸文学的概念，尽管这些媒介本身能带来文学新的样式，如甲骨时期因为雕刻的困难只能产生少量的文本，最早的诗歌和古代散文产生了。网络的产生就产生了超文本，或者说产生了更短的文字，如微博。它们与传播有关。但是，我们无法用媒介来代替文学。如果可以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就要为新媒体确立它的文学性。之后还可能产生另一种媒体，那么，是否还要以那种媒介来确立文学呢？

故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网络文学只是一个权宜的概念，甚至是一个文学的伪概念，必须得以重新确立。

批评的误区和困难

正因为是权宜之计，所以网络文学一直在沿用最早的生成意义，把那些首发在网上，且通俗流行的文学称为网络文学。或者说，因为网络的诞生，使文学拥有了新的活力，为了对这种文学进行概括而不得已拥抱了这一概念。但因为拥抱，所以也走向了狭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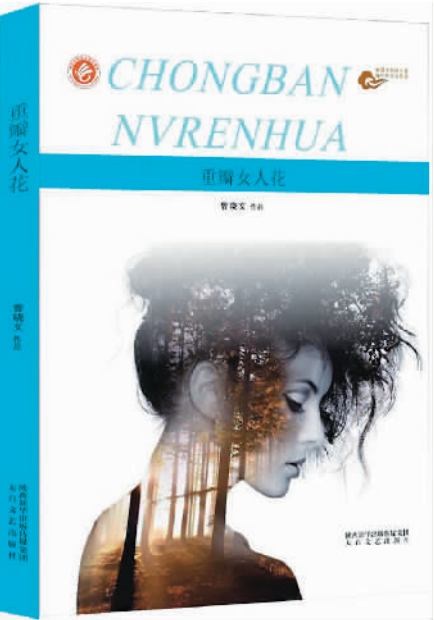
网络文学应当是古往今来所有文学的总和，因为一切文学要么以文字、要么以图片的形式都可以“发表”在网

上。从痞子蔡在BBS上发表自己的小说和大陆西祠胡同BBS的诞生算起，网络文学已经生成快20年了。20年之后，我们应当考虑废弃这一概念，把网络文学归入文学的巨大洪流中。否则，按照今天我们所定义的网络文学，和每年进行的网络文学的排行榜以及对网络文学的研究显示，网络文学就变成通俗文学或流行文学的代名词。如果把那些能赚钱的玄幻小说和言情小说称为通俗文学，而又把那些在新媒体上流行的杂评或流行文本称作流行文学的话，网络文学是有传承的，否则，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网络文学好像横穿出世一样，而过去的通俗小说已消遁了。这会给网络文学的研究带来困难。

目前网络文学的研究，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助推了文学的娱乐化写作，二是过分高扬了文学的产业化功能，轻视文学的社会功能。这恰恰是过去通俗文学的特点。追求市场价值、轻视艺术价值恰恰是它长期以来的特点。当然，并非说通俗文学就没有好的文学。有人会说，《金瓶梅》《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当年也是通俗文学。的确如此。说通俗文学也仅仅是就约定俗成的严肃文学而言的。任何一个时代都如此。通俗性恰恰是文学抵达民间的重要特征，但通俗性与文学性之间有一个恰当的度，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谁能拿出这样一把尺子来呢？其实，这文学家和批评家心中拥有的文学尺度，这一尺度便是文学性与传播性之间最恰当的关系。文学一旦找到这个度，便会插上飞翔的翅膀，就会超越时代性，抵达永恒性。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不谈。现在列的是网络文学研究的负面清单，而这恰恰又是目前网络文学研究的热点和功用。这就成了问题。

同时，这一概念也对我们所称之为传统的文学的批评带来困难。因为网络文学成为通俗文学的代名词后，许多批评家们对网络文学便不屑一顾。网络作家排行榜中基本上都是靠点击量来进行筛选的，因为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上，人们似乎也只能靠点击量来关注作品了，这就使得那些真正有思想内涵的作品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如果我们把网络文学这个概念打碎，重新来进行文学的定义、分类，批评也就有的放矢了。也许到了那一天，失去了一个网络文学的概念，却换来了新文学的大空间。我们就不必要为今天的网络文学摇旗呐喊和固步自封了，就不必要狭隘而执著地为这一通俗性和流行性而硬扛牛耳了。



曾晓文小说集《重瓣女人花》2017年1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出来，走向女人俱乐部，走向纽芬兰，这是走向独立自主尊的过程，也是一种走向多民族相互理解和交流的过程。可贵的是，作者的叙述是平静和平等的，在作者笔下，任何一个民族和民族文化，都包含着某种共通的意蕴。

蕾的爱而不得，晨槿的爱而复得，都经历了人生的苦难，而苦难终成财富。这种人生升华的主题，在海外女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这正是她们经历苦难之后达到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的达成，无所谓种族和国籍，无所谓肤色和语言，只关乎相同的人性。在相同人性的探索与融合中，讲述人类共同的故事，这是海外作家的特点，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我曾经生存过，我曾经奋斗过，我曾经抗争过”——而不断抵达人生崭新的风景，这就是曾晓文作品中自救与救赎的含义。

◎ 作家谈

如此年轻如此辽阔

张闻昕《问青春》

李敬泽

读《问青春》，认识了张闻昕，一个20岁的女孩子。11岁时，她写过《细菌国王秘密日记》，找出来看一遍，看出这孩子心细而有志，细到了、大到了在显微镜下打一片江山、创一个王国。如今，写了这本《问青春》，她长大了，作为写作者的张闻昕获得了神奇的加速度，远超过她的年龄，她已经不是个少年才女，而像是气象不凡的作家，临近高考的那一年那群孩子那些事，竟被她写出了人间辽阔、人情丰饶。

这是另外一种“青春”书写。我本以为会看见阴郁、孤独、冷酷、愤怒，书店里有太多此类拒绝走出青春期的“青春文学”，其中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市场的复杂机制，此处也不必细表。而《问青春》的青春却不是被指认、被订制的“青春”，不是姿态和表情的“乌托邦”，它越出了大众文化的成规，它被张闻昕还原为生活。

成规化的青春书写必须偏狭，必须不公正，必须对人类生活做出粗暴删减。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拒绝领会父母的苦衷、他人的道理，深深地沉溺于自己，封闭于内部，兀自委屈和悲伤——这并非多么不正常，而张闻昕，这个20岁的写作者，她当然是站在青春的内部，站在自己的青春里，但是，这没有阻碍她对他人的好奇、探究和理解、体贴。她的青春不是拒绝对话的青春，相反，在她的笔下，青春之盛大正在于向着他人、向着世界敞开。《问青春》里，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正是那些孩子们之间、他们和成人之间热烈的对话，“问”青春，也是“问”世界，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甚至也不会有终极的答案，问答的过程也正如小说所写，充满了困难、误解和伤痛，但是，正在这热烈的对话中，青春成为了向着更广大世界、向着未来的探索和成长，也充满欢欣和希望。

这就是艺术上和人生观上的“公正”，有这样公正眼光的小说家，看到的“青春”就不是符号，不是某种表情或姿态，青春本身就是是一个生活世界，而生活是多么难以界定，生活的可能性和人的可能性无穷无尽不可封闭。看得到这些，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才能开始他的工作。

而张闻昕正好有这样的禀赋。是的，我认为这样一种面对生活、面对众生和众生的公正，这样一种既辽阔又贴切的眼光对小说家至关重要，在很多作家那里，这种禀赋严重匮乏。他们远比张闻昕有名，却很难说比她更成熟。当今小说中，鲜有见到《问青春》这样的气象：大大小小的场面纷至沓来，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场面推动，这是在人间，这是人走进和拓展他的世界，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形成自己、呈现自己。《问青春》中充满活生生的人的关系，所以必定是有声的、说话的，众声喧哗。——这些都使我想起中国古典小说和19世纪西方小说的传统，也让我想起现在很多“纯文学”小说：小说家不让他的人物开口，一定要让人沉默，在心里没完没了地想啊想，人被切割封闭在一种被观念界定出来的“私人生活”里。他们由此失去了基本的艺术眼光和能力：在人间、在人的整体存在、在人和世界的全部关系中认识人、想象人、塑造人。

很多小说空旷无人。而《问青春》里有那么多的人，有名有姓的几十，性格鲜明的十几。张闻昕似乎不太费力，她兴致勃勃，她是一个受过传统训练的肖像画家，她确信，人和人不一样。这种使人间变得如此有趣的差异，既是出于天性，更是出于家庭、环境，出于种种个别条件的复杂作用。一个作家或一个画家面临的考验，正在于把“这一个”、把一个个的“这一个”辨认出来、刻画出来。

说来容易做到难，张闻昕竟然做到了。她表现出在这个年龄很少能够达到的准确和娴熟。可能是，她的心里本来就有这么多的人，她对他们满怀兴趣，用显微镜仔细研究他们。与此同时，掌握显微镜并没有使她变得骄傲专横，她爱他们，分享每一个人的“秘密”和“真理”，怀着惊喜、敬意。

张闻昕当然还小，前路漫漫，还得不懈努力，但是，一部《问青春》在眼前，一边看着，一边忍不住赞叹：果真是梦中携回一支笔，细写世间万般情！

《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出版

《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的访谈集《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书中对33位国内有军旅经历或仍在部队服役的作家进行访谈，包括白桦、毕淑敏、都梁、二月河、马识途、魏巍、谢颢、阎连科、朱苏进等。这些作家年龄层次、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但军旅生涯却给他们的创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贵祥所说，舒晋瑜的访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作家的发现，发现他们的童年，发现他们的经历，发现他们的阅读，发现他们的风格，发现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文学观，发现他们丰富驳杂的精神世界，一言以蔽之，发现他们的奥秘。舒晋瑜的访谈第二个特点是文学性，用文学的方式表现文学人物和文学现象。她甚至会越过“访谈”这样带有规定性的文体规范来书写她的对象。她为我们了解当代中国文学描绘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文一）

◎ 新作评介

不平则鸣和爱的救赎——从曾晓文的《重瓣女人花》说起

陆蔚青（加拿大）

让我们首先介绍晨槿。她是曾晓文作品《重瓣女人花》中的主人公。这部中篇小说因为描写不孕女性的题材而引人注目。不孕女性是一个精神上的弱势群体，晨槿受到婆婆从中国到加拿大持续不断的冷暴力，她也在这种冷暴力中心甘情愿地毁灭自我，丧失了人格尊严和基本生存条件，进入了人生的黑暗期。不幸的晨槿遇见了幸运。西人律师凯琳自愿为她辩护，让她看似无望的案件峰回路转。然而出狱后的晨槿依然陷入自卑、麻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同为不孕女性的凯琳成立了“重瓣女人花”俱乐部，在这里，个人命运开始具有了社会意义。晨槿开始走出狭窄的自闭，走入了广阔的人生。晨槿终于在友情、爱情的温暖和大自然的启迪中找回了生命的自洽和尊严。人性的自救和救赎，成为了作品最后的结局。

在曾晓文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自救和救赎这一主题的反复出现。在她笔下，很多人物都经历过激烈的人生波折，入狱判刑等重大人生事件在不同小说中的反复出现，并不是作家对故事情节奇巧的盲目追求，相反，它们是个性化人生经历在作品中的分裂、交融和体现。

社会案件往往是人类情感聚焦的爆发，而在爆发之后的种种人性是作者致力挖掘的线索，沿着这个线索层层递进的写故事后面的故事，故事中的事物，人物命运形成的过程和原因以及由此揭示出人性的层面，这是曾晓文写作的特点。在《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中，社

会新闻是相对隐性的，它体现在肖恩这个人物的命运中；在《重瓣女人花》中，这条线索是显性的，开篇就是家暴，然后逐渐递进，层层深入。但无论隐性还是显性，都是作者写作的切入点，是对人性挖掘的独特视角。

在人物命运的悲剧之后，曾晓文写作的重点往往是生命修复的过程。小男孩展飞之于蓝鸟队的诺瑞斯（《小小蓝鸟》）、凯琳之于晨槿，肖恩之于蕾，疗伤是相互的，也是永恒的。在小说《特洛伊木马记·2015》中的薇琪，在修复电脑病毒时也要修复自己。曾晓文曾经说过，她写作的过程是缓慢的自我修复的过程。

修复是有指向的，修复需要自救和救赎。在曾晓文笔下的人物都具有自救的勇气和能力，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在苦难中拯救自己。蓝鸟诺瑞斯通过帮助病孩展飞实现梦想的过程，重新找到自我的价值。而蕾，在与肖恩若有若无的情感交流中，通过一个并不完美的爱情，获得了实现人生意义的机缘。他们都因为来自不同方面的爱而得到了救赎。这其中也涉及到一些永恒的命题，比如给予，奉献，爱与悲悯。也就是说，在曾晓文作品中，人物的精神都指向相同的主旨，这就是爱的救赎。

爱的救赎的写作是曾晓文写作明显的特点。曾晓文作品中有明确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不是绝望彷徨，不是迷茫压抑，而是自我在艰难境遇中的奋斗和生命的回归。而在曾晓文写作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普遍的命题，即海外华

文的写作者，其文化发生学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课题。他们写作的开端往往印证了文学发生中最本质的缘由，就是“不平则鸣”。而这种“不平则鸣”，因为对自身境遇的倾诉和对身边他者生存状态的叙述，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更加值得关注。

治愈的主题，一直是曾晓文作品中的精神线索。在《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重瓣女人花》这两篇小说中亦有深刻体现。有人说文学是一种治愈。晨槿与蕾都是这样被爱治疗的人，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通过自爱 and 爱人得到内心的平复和提升。蕾在经历了肖恩的死亡之后，成为了一个心理医生，两个人一段爱情的结局，由此升华到对其他人的关注和帮助，是作品达到的另一个高度。爱最终战胜了孤独和死亡。

对一个作家来说，写作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平等地讲述中西故事，是曾晓文提出的文学观点，而她的创作是对这一观点的具象表达。在《重瓣女人花》中，这种平等的视野表现得更加明确。在小说中，她不仅讲述了华人女性的故事和命运，还讲述了西人女性的故事和命运，更讲述了她们之间的真挚友情，这种信任 and 互助建立在平等的人格之上。尽管依然保有不同的性格和文化背景，在对待命运的安排上，却达到了共识。晨槿在凯琳的启发下，开始正视内心并改变着对不孕女性命运的看法，她逐渐找到了自信。在这里，人物的性格是在不断发展的。从狭窄冷酷的家庭走